

论中国模式



上



赵剑英 吴波/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中国模式 ①

赵剑英 吴 波/主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中国模式(上、下卷)/赵剑英,吴波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04-8902-3

I. ①论… II. ①赵…②吴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1227 号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70.25 插 页 2

字 数 1078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全二册)

论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问题(代序)

赵剑英 吴波

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问题，之所以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如此众多关注的目光，并不仅仅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所引发和推动，而是中国改革开放行进了多年之后的自然结果。因此，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不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随着中国模式所蕴涵更为深刻的话题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随着一系列争论性问题的逐步展开，中国模式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也进一步清晰。本文拟就关涉中国模式的几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供大家批评。

一 多维视野中的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好，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也罢，拘泥或纠缠于概念的使用并不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首先需要认真对待和回答的，应该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的必要性的问题。判定这些概念提出的首要意义，应该说正在于此。这一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近几年来渐趋高潮，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道路问题的实践基础，并由此也决定了在中国道路问题上的肯定性评价的前提。任何一个不带政治或文化偏见的人，将30多年前的中国与30年多后的中国加以比较，都不能不感叹在这短短30年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都不能不感受到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土

地上所洋溢着的勃勃生机。与此同时，另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认为，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共同构成了国内外学者探讨和分析中国最近 30 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的内在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这短短 30 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探索出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实践形式逐渐趋于定型化，并因由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具有了肯定性的意义。几乎所有对中国模式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没有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 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宣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在这次大会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作了深入全面的概括，提出了“十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并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十个结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们党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进行主动性概括和系统性总结，无疑为深化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对改革开放 30 年历史进程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道路问题始终是一个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争论性话题。伴随着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肯定性阐释的，是关于中国未来道路问题的激烈争论。进入 21 世纪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等多种社会思潮都明确表达了影响中国道路方向的政治意图。这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声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原因。应该看到，我们今天讨论中国道路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提问。有学者指出，对“中国模式”的界定，首先取决于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认识。必须在思想上澄清，中国在未来追求的仍然是西方现代的物质生活方式，而“中国模式”仅仅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还是中国模式本身就与西方式的物质

主义不相容。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才有望在逻辑上实现彻底的一贯。^① 不难得出的结论是,关于中国未来道路方向的争论本身也是中国道路问题成为焦点问题的重要依据,并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

从国际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就的取得也吸引了国外各种各样审视和分析的目光,从而凸显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意义。如果说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②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佐治亚帕里米特学院刘亚伟教授就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人惴惴不安,而把中国的崛起上升为一种理论更让很多美国人忧心忡忡。“中国模式”可能最让美国人担心的一点是,它是不是意味着中美永远不会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可见,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无论是善意的赞扬还是妖魔化的唱衰,所依据的因素大都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有关。确实,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并非中国。但“北京共识”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正如德里克所说的,“雷默先生的贡献在于把它同中国发展模式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无论是不是一个陷阱,但毕竟创造了国内外深入研究中国模式的一个契机。在这一背景下,全面系统地陈述自己的发展理念,让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对于中国自身未来的发展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虽然使用哪一个概念无关紧要,而且很多学者对于诸如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等概念并没有严格地加以区分而是简单混用,但我们还是需要面对诸如“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等概念作一致性理解的任务。因为在一些学者那里,不同概念的使用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立意和出发点,同时也涉及对内涵的不同理解和把握。比如,有的学者不主张使用“共识”的概念,因为“共识”

^① 唐士其:《中国道路“模式”化了吗?》,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10年第2期。

^② 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①有的学者也不主张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要继续探索。而讲“模式”，有定型之嫌。^②有的学者对此反驳，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因为我们今天学术界和媒体所说的各种模式均处在变动、发展之中，都面临着挑战；二是如果只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定是僵化的，这显然是不对的。^③我们还看到，即使使用同一个概念，不同学者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学者认为，讲中国道路，其实所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④；有的学者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析放在了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历史框架之中。^⑤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道路是近代120年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⑥

但从总体上而言，“中国模式”一词的使用频率和认同度相对较高。在有的学者看来，“模式”一词的使用首先就是用来说明自己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是对其特殊性的界定。^⑦有的学者认为，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因为“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善于总结概括自己发展经验的国家才有“梦想”、有希望、有方向。肯定中国的进步，发现中国进步的“法宝”，并指出眼下危机的原因，是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针对一些人关于“中国模式”并不是由中国人，而首先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不宜使用等观点的质疑，有的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

① 参见俞可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模式”及其基本特征》，《红旗文稿》2005年第19期。

② 李君如：《对“中国道路”的几点看法》，《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6日。

③ 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④ 朱佳木：《新中国两个3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

⑤ 夏春涛：《近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9期。

⑥ 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⑦ 参见周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它所指,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非就是指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的抉择、所走的道路、所用的方法。^①有的学者认为,“模式”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从社会发展意义上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任何疑义。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

对“模式”一词的趋于认同并非无足轻重。“模式”话语所形成的共识确实意味着:第一,“模式”一词的使用,蕴涵着一种对中国模式业已基本定型和基本成熟的判断。第二,“模式”一词的使用,也蕴涵着对这一模式的肯定性认定。第三,由于“模式”还具有把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可以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或供其效法的“样板”的含义,因此,虽然探索中国模式的“着眼点不仅不是、而且恰恰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给苏联模式自封样板和示范,而主张各国要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但确实意味着这一模式具有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内容。而对诸如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等概念作一致性理解的关键在于进行外延的框定。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学者作出了努力。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发展实践”共同构成的社会发展模式。^②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③在我们看来,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模式可以认为是对中国模式的外延进行框定的三个主要范畴。

① 徐崇温:《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② 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③ 俞可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模式”及其基本特征》,《红旗文稿》2005年第19期。

二 中国模式: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模式的创新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究竟应该不应该对中国模式作社会属性的追问逐渐浮出水面。换言之,现代化模式是不是一个与社会属性相联系的概念,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少需要面对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在一些学者看来,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存在,而且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不仅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没有必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字样。这种有意或无意忽略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的看法,其实是将发展模式归结为与社会属性无关的问题。另一种是,在认可中国模式现实合理性的同时,将这一模式视为了西方同道。在他们看来,之所以标出“社会主义”的字样,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显然,与前者相比,后者并不回避有关社会属性的话题,只不过作了另一种解读罢了。

在我们看来,就这种模式是不是应该进行社会属性的判定,究竟应该作哪一种社会属性的判定,可能是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所必须面对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的方法论问题。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一席话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集中回答。他说:“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国国内或国际上有人试图消灭这一遗产。“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都能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①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这本书“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他认为:“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②,而这两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构成了该书所要考察的重要论题之一。罗兹曼在这里只是从一个层面说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虽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历史和国情固然不可

①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②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分,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与社会属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基础性意义。恰是社会属性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化道路的形态。就此而言,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而非一个层面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依托这一基础探讨这条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区别与联系。

毫无疑义,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探索出一个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相适应的现代化道路,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当然,这首先需要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自然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原有现代化道路基础上的一种发展,但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全面澄清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其中核心的一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仅仅强调前者绝不是一般的疏漏,而是核心价值的偏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无论在实现方式上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般而言,就其实现方式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效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灾难,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失为前提。就其历史任务而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不同的是,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现代化从它起步起就必须担当起实现超越目标的历史任务。^①

我们由此需要深入思考中国模式所蕴涵的双重超越的问题。第一重超越的对象是苏联模式。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②显然,中国模式的

① 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首要参照物是苏联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首要意义在于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但我们还不能停留于这个层面，因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模式的一个前提性内涵是中国已经完全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换言之，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才是中国模式的底色。

然而，正是在革除苏联模式弊端探寻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出现了借革除苏联模式弊端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思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强调，是他对中国道路的后一重超越的提醒和告诫。即在努力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也要时时警惕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侵袭，避免滑入西方现代化的陷阱。他反复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①“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②邓小平讲过：“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③这句重要论断可以视为对中国模式双重超越的集中表达。

基于社会主义的语境对于中国模式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按照邓小平的话说“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既是中国模式确立起来的唯一途径，也是进一步完善中国模式的根本方法。第二，中国模式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按照邓小平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中国模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试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② 同上书，第204页。

③ 同上书，第256页。

图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①。按照邓小平的话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②。

进一步而言,中国模式共有三个层次的内涵。

第一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显然,当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模式的核心理念时,事实上已经蕴涵着一种性质上的判定,即我们所讲的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一般性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要求共同决定的产物。中国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理念,是中国模式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之所以扩大的主要原因。而西方一些人之所以不愿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就是认为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使用这个概念,就等于把中国取得的成绩归因于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承认了所谓“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历史终结论”的荒谬。

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和体制。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制度,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制度和体制性内容。

第三个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和改革发展的战略策略。关于改革的方法和经验层面的总结和概括,就属于这个层次的内容。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③ 应该看到,中国模式三个层次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片面的认识都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我们需要在整体性的视野中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而不能作

① 林春:《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读书》2006年第4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③ 张维为:《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学习时报》2009年7月8日。

割裂或分立式的理解。不难看出，即使停留在改革经验这个层面上来认识中国模式的内涵，也不仅不排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以之为基础。

三 新中国两个 30 年：中国模式的探索

中国模式的研究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 30 年的关系即前 30 年和后 30 年的关系，是在探讨中国模式时另一个绕不开的课题，这也涉及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的又一个方法论问题。因为如何看待这两个 30 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对前 30 年和后 30 年各自的历史评价的问题，而且直接关乎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认识本身。

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概括指出了两个方面的倾向。他认为，如果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 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 30 年（1949—1979）和后 30 年（1979 年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对一个对新中国前 30 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 30 年才能够解释后 30 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 30 年来否定其后 30 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 30 年和后 30 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① 按照前者的观点，将新中国的前 30 年历史与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联系起来考察，只具有对立性比较的意义。在他们的视野中，新中国的前 30 年是失败，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由此推理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模式与前 30 年无关。如果说有关系的话，也只具备反面教材的意义。进而言之，后 30 年从失败走向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是因为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与这种判断相一致的是，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就是进一步“走向世

^①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 年第 6 期。

界”，直白地说就是全面西方化。而按照后者的观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改革至今其实已经走上了邪路，中国未来的正确道路是对毛泽东时代道路的整体性复归。上述种种论调在提醒我们，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和把握，必须基于对新中国两个30年的关系的整体性视野。否则，中国模式的讨论和研究就会不可避免地进入误区。

基于整体性的视野，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框架中科学评价前30年的历史，是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中国模式虽然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探索应该上溯至毛泽东时代。历史的事实是，正是毛泽东最先提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大课题。在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毛泽东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他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②《论十大关系》可以视为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初步成果。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其中立意：“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③一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中国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努力，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本来也有可能严格按苏联的榜样，逐渐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毛泽东摒弃了苏联的道路，“使中国走上了另一条新路”^④。费正清敏锐地认识到“‘大跃进’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 吴冷西：《忆毛泽东》，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页。

④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

而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①。

对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一定要采取历史的、辩证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功过与是非。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简单评判，都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认识误区。对于这30年，一方面，应该看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付出了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提供了物质基础、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正如有学者概括的，“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过程中，所积累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前提，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准备”。^②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③肯定性的方面无疑应是评价这一段历史的主要方面，但这恰恰也是被一些人所严重忽略或质疑的方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这一历史时期的探索始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框架，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没有探索成功，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刻反思和总结的经验教训。

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改革开放13年和新中国前29年的关系发表过重要的评论：“近十三年是和前二十九年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前二十九年的成就为基础，就不可能有近十三年的更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前二十九年的经验，就不可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正确的

① [美]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

② 王伟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开创》，《红旗文稿》2009年第18期。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道路。”^①这一方法论告诉我们,虽然中国模式所标识的是改革开放的经验,但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难以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也就难以理解前30年的曲折探索与后30年的成功实践的内在关联。邓小平的一番话具有总结性的意义。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中国模式固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成果,但它绝非横空出世。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超历史的抽象存在,内在地包含着前30年的种种因子,一脉相传的核心内容正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阿里夫·德里克提醒那些对中国经验感兴趣的人们:吸引外部观察者的那些方面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产物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这些主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悠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改革开放30年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30年,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它既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相反,它在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战略等方面,与前30年之间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使两个30年内在联系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③

这种继承性也证明了后30年中国道路不是一种对前30年道路的改弦易辙。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模式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是新中国两个30年探索的理论结晶。有意或无意将两者对立或者割裂开来,必然会造成我们在认识和理解中国模式上出现严重的偏差。无视这一模式的历史渊源和继承性因素,一味将其中基本内涵全部视为创新的产物,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赋予中国模式以更多的光荣。恰恰相反,如果忽视了继承性,既难以为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③ 朱佳木:《新中国两个3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

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正名，也难以获得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机会和可能。创新如果缺乏这一依托，就可能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当然，中国模式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正确看待这一模式的创新性因素，就难以客观地对待前 30 年存在的问题。忽视了创新性的一面，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启新的探索的历史必然性，也无法获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和根据。具体而言，制度和体制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作出的适应性让步、实践纲领的战略调整以及改革的方式和策略等无疑都是创新性的方面，正是这些因素成为中国模式超越性的具体表征。

四 中国模式与中国问题

对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成果的中国模式的研究，还需要遵循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将中国模式的讨论置于中国模式与中国问题这两个因素共同构成的语境之中。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国模式和中国问题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片面性的立场必然难以正确地说明我们的成就和我们的问题，也难以对中国模式形成正确的评价。因此，当我们郑重强调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之中时，一方面是明确这个模式还远非十全十美，需要进一步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郑重强调这一点时，还必须承认我们仍然需要面对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讨论中国模式，必须基于成就和问题两者的统一，基于应然和实然的统一。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必须超越肯定性阐释的意义框架。

坦率地说，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一起进入 21 世纪的，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短短 30 多年时间里，中国就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之一。有社会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当前的问題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上，而且体现在更广泛的利益分化上。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趋势。这一时期，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都变得异常明显。“如代内向上流动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